

# 语境、认同与立场：十七年时期郑成功 历史书写的转变(1949—1966)

段锦珂

**[摘要]**十七年时期是中国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英雄研究的奠基时期。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虽然自晚清以来其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长盛不衰,但其背后承载的政治语境、身份认同及价值立场在十七年时期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抗战语境到国家统一语境,从汉族的民族英雄转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英雄,从发扬民族精神的民族立场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立场,是十七年时期郑成功民族英雄历史书写转变的三大特征。以郑成功的历史书写为脉络,重新审视十七年时期史学界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对新时代如何理解、书写民族英雄必将有所裨益。

**[关键词]**郑成功;民族英雄;十七年时期

民族英雄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重要概念。它在深刻塑造近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共同记忆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争议。学界围绕民族英雄的概念界定、标准及评价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sup>①</sup>。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其历史书写自晚清发轫,经抗战时期走向兴盛,至十七年时期再度成为研究焦点,百余年间绵延不衰<sup>②</sup>。不过,即使十七年时期郑成功始终被称为民族英雄,但其背后承载的政治语境、身份认同及价值立场已发生了深刻转变,不可与此前同日而语。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转型时期,是近代以来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英雄研究的奠基时期,研究这一时期郑成功历史书写的转变是理解民族英雄概念演变的关键。目前,关于郑成功历史书写的研究,学界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大多集中在晚清民国<sup>③</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196);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点资助项目“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3RXY002)。

**[作者简介]**段锦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邮箱:1257582316@qq.com。

<sup>①</sup>管彦波认为“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民族英雄的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最多、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详见管彦波:《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研究的考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赵永春、孙婉婷认为学界关于民族英雄共有六种不同的观点,详见赵永春、孙婉婷:《民族英雄评价问题学术讨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2期。

<sup>②</sup>晚清时郑成功民族英雄的书写便已出现,1903年匪石开始连载郑成功的传记,将其称为中国的英雄。详见匪石:《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东京)《浙江潮》,1903年第2期。

<sup>③</sup>详见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33期;陈忠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对十七年时期郑成功的历史书写探讨稍显不足，对其转变的具体分析也较为欠缺<sup>①</sup>。研究十七年时期郑成功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不仅有助于从多重视角理解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学的学术转型，厘清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英雄概念发展演变的思想逻辑，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 一、从抗清到复台：政治语境变化下的民族英雄叙事重塑

“学术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sup>②</sup>，史学始终无法脱离特定的政治语境与时代背景，郑成功的历史书写亦是如此。兴盛于抗战语境中的郑成功历史书写，为鼓舞抗日，将抗清作为其民族英雄叙事的中心内容。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成为新的时代任务，因此其叙事重心从抗清向复台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因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击清廷的行为而将其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是出于当时特定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在肯定其起到鼓舞抗战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陷入了大汉族主义的误区，因此我们应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其理性看待。

郑成功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原非中心人物，《明史》无传，乾隆时编修的《逆臣传》载有郑成功事迹，但附在郑芝龙传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郑成功只是作为闽台一带的地方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有限<sup>③</sup>。直到20世纪初期，在民族主义与排满思潮风起云涌之际，郑成功作为革命党人反清排满的精神偶像，才逐渐成为历史上的焦点人物。刘师培在其《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中指出，“现在的中国人，稍为能说几句排满革命的，都晓得说郑成功是个英雄”<sup>④</sup>。郑成功的历史书写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虽然发端于清末民初，但郑成功的历史书写真正走向高潮却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sup>⑤</sup>，郑成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普遍称为“民族英雄”的。东北的沦陷、日军的入侵让时人感慨“民族销沉大可哀”<sup>⑥</sup>，“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时期？不像明末时吗”<sup>⑦</sup>？人们希望有郑成功这样的英雄奋起抗争，收复国土。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时人从历史中寻找抗敌的精神资源，郑成功的抗清被赋予了不屈服于外敌、坚持收复国土的现实意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迹也在其抗清事业中加以考虑，台湾作为郑成功抗清的根据地，更凸显出郑成功的矢志不渝。以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几部郑成功传记为例：王钟麒的《郑成功》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讲述郑成功据守金厦、进取福州、北伐瓜镇等抗清事迹，而“台湾之营辟”却不足十分之一<sup>⑧</sup>。周木斋的《郑成功》开篇直接从日本侵夺东北四省与台湾切入，进而引出郑成功这位在“东南一隅反抗满清”的英雄<sup>⑨</sup>。章衣萍与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

①李细珠指出1949年以后“大陆方面则把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资源”，详见李细珠：《1949年以来的明郑台湾史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江仁杰认为十七年时期郑成功的形象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英雄，详见江仁杰：《解构郑成功——英雄、神话与形象的历史》，中国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31-135页；杨林润的硕士论文也涉及了十七年时期郑成功形象的变化，详见杨林润：《郑成功历史形象变迁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②王学典：《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再审视》，《光明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11版。

③参见高致华：《郑成功信仰》，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

④光汉：《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20期。

⑤“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吾国称道之”，详见葆青：《慧修龛丛谭：郑成功祠联语》，《西南周报》，1932年第5期。

⑥慈石：《读郑成功传》，《师亮随刊》，1931年第4集。

⑦《郑成功的志愿》，（北京）《益世报》，1934年8月27日第6版。

⑧参见王钟麒：《郑成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⑨周木斋：《郑成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第2页。

《郑成功》亦是如此,只是语言更为通俗<sup>①</sup>。

日军全面侵华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播迁重庆,大片国土沦陷,时人有以南明类比国民政府<sup>②</sup>,失败气氛弥漫一时。1939年,日本学者秋泽修二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而“外族侵入便是促使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sup>③</sup>,从而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历史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sup>④</sup>,便是史学界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尤其具有代表性。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把抗清简称为“抗战”,把投降清朝的汉族官员和军队称为“汉奸”和“伪军”。他以郑成功父降子不降来说明抗清的正义性,同样也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为了做“抗清根据地”<sup>⑤</sup>。翦伯赞虽然未对郑成功作详细论述,但他写了多篇南明史的文章,揭露南明政府的抗清不力,并在《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斥责郑芝龙的投降<sup>⑥</sup>。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家写郑成功是为了“千方百计地把历史同政治斗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sup>⑦</sup>,因而他们同样将抗清作为郑成功历史叙事的重心,用抗清来影射抗日,将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同抗日战争联系起来。这种历史书写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叙述,因此随着时局变化发生转变也是应有之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退据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派第七舰队入驻台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1954年,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国干涉、解放台湾统一全国成为新的时代任务。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事迹既象征着将美国势力赶出台湾,又蕴含了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内涵,因此收复台湾开始作为郑成功历史叙事的重心。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容美国侵略者染指!》一文,文中写道:“一六六一年郑成功率领约三万军队,自福建进军台湾,推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乃在台湾建立了中国的政权”<sup>⑧</sup>,肯定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的意义。1954年《人民日报》社论《告台湾同胞》提到,“一六六一年郑成功兴军收复台湾时,曾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拥护,终使荷兰殖民军队战败投降”<sup>⑨</sup>,将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中国革命斗争史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成功传记鲜明体现了这种叙事重心的变化。1955年,方白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郑成功的个人传记。虽然在书中方白仍然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郑成功的抗清事业,肯定郑成功在父亲郑芝龙投降之后起兵反清、北伐南京等抗清斗争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节,但在内容提要中说本书“着重地叙述了郑成功在明末领导人民反抗满清统治者和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经过”<sup>⑩</sup>,把驱逐荷兰收复台湾与抗清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且书中第一章并未像民国时的郑成功传记那样从郑成功出生与明清战争讲起,而是直接以“进军台湾”为第一章标题,并对台湾的情况和荷兰人侵占台湾的过程及罪恶统治进行了介绍和揭露,进而突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重要性。书中依旧提到郑氏将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但更多阐发了收复台湾在恢复国土、促进台湾发展上的

① 参见章衣萍:《郑成功》,上海:儿童书局,1936年版;《郑成功》,南昌: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1937年版。

② “当平津失陷,抗战初发动的时候,有些人以为中国又将成为东晋南北朝以至南宋南明的局面”,详见《恶意的污蔑》,《战地》,1939年第10期。

③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

④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

⑤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出版地不详,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672页。

⑥ 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1941年第8卷第1期。

⑦ 田余庆:《历史主义无罪》,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容美国侵略者染指!》,《人民日报》,1950年9月18日第1版。

⑨ 《告台湾同胞》,《人民日报》,1954年9月5日第1版。

⑩ 方白:《郑成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内容提要”。

重要意义：“……祖国的战士们在延平郡王的率领和指挥下，解放了这块美丽的土地……台湾，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sup>①</sup>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系列也出版了《郑成功》一书，与方白类似，该书第一章介绍台湾史地概况和荷兰侵占台湾的过程，在肯定郑成功抗清功绩的同时，更是高度肯定了他收复台湾的功绩，“台湾人民把郑成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沦陷了三十八年的台湾重又回到祖国的怀抱”<sup>②</sup>。吴紫金、洪卜仁的《郑成功收复台湾记》、朱偁的话剧剧本《郑成功》以及著作《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也都是以郑成功收复台湾为主题<sup>③</sup>。

1962年在厦门召开的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以下简称“厦门讨论会”）上，将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研究推向高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辉的事业”<sup>④</sup>，复台取代了抗清，成为郑成功历史叙事的重心。朱杰勤还构建了郑芝龙——郭怀一——郑成功等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领土的一脉相承的英雄系谱，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迫使荷人投降，不敢再行侵略中国，保持了我国的领土主权。民族英雄的称号，郑成功可以当之无愧”<sup>⑤</sup>。郭澎、陈国强、丁名楠主要从反殖民侵略的意义上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sup>⑥</sup>，蒋炳剑、李瑞良、陈诗启、韩振华则从台湾经济贸易发展的角度肯定郑成功对台湾发展及促进台湾与大陆交流的贡献，并与荷兰殖民者的剥削奴役形成对比，揭露荷兰侵略者的罪恶<sup>⑦</sup>。与会学者的研究不再将收复台湾视为抗清的附属行动，而是将复台作为郑成功研究的核心。这种叙事重心的转变，清晰地呼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部干涉的时代需求，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精神资源。

## 二、摆脱“大汉族主义”：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英雄的重新定位

中国传统史学自古以来便有“华夷之辩”的思想。自孔子作《春秋》提出“尊王攘夷”，到王夫之所说的“中国”“夷狄”“天下之大防”，每逢中原政权衰微之时，“华夷之辩”总会为士人反复论及。清末的民族危机一方面促进了“华夷之辩”思想的复活，一方面又引入了西方的种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掀起了一股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热潮，把中国历史割裂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对抗的过程<sup>⑧</sup>。郑成功的历史书写便沾染了这股“大汉族主义”思潮，使其作为汉族的英雄而风靡一时，这明显不利于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

20世纪初的几部《郑成功传》都将郑成功的事迹置于汉族与其他民族对抗的历史过程中，并将

①方白：《郑成功》，第92页。

②北京丰盛学校第一部：《郑成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4页。

③参见吴紫金、洪卜仁：《郑成功收复台湾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朱偁：《郑成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朱偁：《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④郑学稼，陈孔立：《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⑤朱杰勤：《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⑥郭澎：《从反殖民主义斗争史方面评价郑成功》，《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丁名楠：《十七世纪中国人民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胜利斗争——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历史教学》，1962年第3期。

⑦蒋炳剑：《郑氏时代台湾农业的开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陈诗启：《郑成功驱逐荷兰前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李瑞良：《郑成功和海外贸易》，《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21期。

⑧此类著作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黄节的《黄史》等，详见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99—215页。

郑成功作为汉族的英雄。柳亚子在《郑成功传》中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汉族“民智日陋,民气日弱,北狄贱种乃得珍其臂而夺之”,而郑成功就出生在这关系着“汉种存亡绝续”的时代。他认为郑成功抵抗“异族”,为汉族“保种保国”,是“我汉种之郑成功也”。柳亚子还特别强调他不屑崇拜所谓“蒙古种”“汉人之公敌”的成吉思汗,只有郑成功这样的人才能“焕扬我祖国之荣光”<sup>①</sup>。在柳亚子的观念中,“祖国”与“汉族”是等同的,郑成功因为是汉族的英雄,因此才是国家的英雄。刘师培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亦持此论。他认为清军入关是“满洲盗窃中国”,从那时候中国就开始亡国了,而亡国的最后日期正是清军攻占台湾。因此他总结郑成功的功业,第一是“保种”,第二便是“辟地”,一方面为汉族攘斥“夷狄”,一方面与白种人争雄于海上。在晚清排满革命风潮盛行之下,革命党人将清军入关后的朝代更替视为汉族国家的沦亡,因而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种把明朝政权看作是汉族政权,把汉族政权与“中华”“中国”等同的国家认同,才使郑成功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想象中的民族英雄<sup>②</sup>。

民国建立后,排满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这种以汉族为本位的历史书写,将“中国”等同于汉族政权的思潮在民国时期却依然存在。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还提到“中国经过了两度亡国”<sup>③</sup>,把清军入关称为“异族入侵”,将明朝灭亡称为中国“亡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入侵唤醒了历史上的“亡国”记忆,让时人不自觉地把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类比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的流行。郑成功作为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在此时得到进一步阐发。周木斋的《郑成功》认为郑成功“固然忠于一姓,存续明统”,但同时也是“忠于汉族,存续汉统”<sup>④</sup>，“不但扬威海外,且以台湾为根据,进而反抗异族的统治”<sup>⑤</sup>,这些正是他作为民族英雄的特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也强调郑成功克复台湾后,“筑馆以招明之遗臣。渡海附之者如织。天南片土,依然保存着汉族的衣冠”<sup>⑥</sup>。即使此时“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广为流传<sup>⑦</sup>，“汉统”“汉衣冠”对于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仍然有极强的标识作用。

不过,当时已有学者意识到这种以汉族为本位的历史叙事存在不妥。当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含郑成功在内的四十位民族英雄之后,王德亮便认为由于“古今疆域异制”,像蒙恬、郑成功等人,“不足以风起现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反抗的所谓“外族”,“迄至现在,因有多年之接触,已皆互相糅杂,趋于同化”,“决非仍如往昔之单纯种族可比”<sup>⑧</sup>。王德亮还认为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匈奴、突厥、蒙古不过是历史上的地理名词,与其矛盾“不过如一时之兄弟阋墙”,今日应以中华民族的团结为重,不应该再有畛域之见。王德亮揭示了这种狭隘民族观念与现代国家认同的龃龉之处,可惜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思想上的惯性,在对明清嬗代的历史书写上仍然存在以汉族为中心的倾向。1951年叶蠖生所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联明抗满小史》中,甚至将清朝比作美国,称其“几十年来处心积虑已是专门侵略中国的老手”<sup>⑨</sup>。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在叙述郑成功抗清的事迹时仍然把“满清”和“中国”对立,认为清军入关是“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把清朝的统治称为“民族牢狱”,

① 亚卢:《郑成功传》,(东京)《江苏》,1903年第4期。

② 关于“单一民族国家想象”,详见王珂:《“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页。

④ 周木斋:《郑成功》,第59页。

⑤ 周木斋:《郑成功》,第2页。

⑥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⑦ 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⑧ 王德亮:《对中央所选民族英雄之商榷》,(上海)《时事新报》,1937年6月18日第3版。

⑨ 叶蠖生:《明末农民起义军联明抗满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页。

“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在尚钺的叙述中是等同的<sup>①</sup>。1955年出版的《郑成功收复台湾记》中也认为清军入关是“外族侵入中国”，并称赞郑成功与父亲划清敌我界限，对抗清军卓有战绩，在1658年就已经成为“人民热烈爱戴的民族英雄了”<sup>②</sup>。华而实创作的关于郑成功的电影剧本直接以《汉衣冠》为名，着重讲述郑成功自离开日本到北伐抗清的事迹，这个剧本还获得了新中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电影剧本奖。在《汉衣冠》的最后一幕，作者以郑成功将士的歌声收尾：“半生浪迹天涯遍，十年未改汉衣冠。驱异族，伸正义，收失土，祭祖先。”<sup>③</sup>这说明新中国初期史学界在书写民族英雄时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不当认识。

伴随着“一五计划”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各级机关都将克服大汉族主义作为民族问题上整风的重点。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此类问题，有学者便批评尚钺在编写《中国历史纲要》时“夸大蒙古、满洲等族的入侵和统治所造成的倒退”，“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上汉族同其他各族之间的‘种族斗争’”<sup>④</sup>，认为这是大汉族主义倾向的体现。在随后的“史学革命”中，“大汉族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体现而受到广泛批判。吴枫的《隋唐五代史》便因将突厥称为“异族”而被批判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sup>⑤</sup>。政治运动推动了史学界的观念更新。1961年，刘大年的《论康熙》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刘大年反驳了以往将清朝入关视为“外国对中国的征服”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康熙及清朝统治者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刘大年强调“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认为从汉族和非汉族出发“把清政权的统治看做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是陷入了“资产阶级大汉族主义观点”的泥坑里<sup>⑥</sup>。岑家梧也指出“凡是今天祖国版图以内的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是国内民族，不能称为‘外族’和‘外国’”<sup>⑦</sup>。在这种情况下，再将郑成功抗清作为其抵抗“异族”侵略的光辉事迹，便有悖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当时强调多民族的国家认同格格不入了。

与此同时，50年代末期，毛泽东判断世界革命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认为在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斗争下，资本主义阵营的势力已经削弱，号召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美国作为“头号帝国主义国家”首当其冲<sup>⑧</sup>。因此，回顾郑成功驱逐荷兰收复台湾的历史，“就可以看到目前第三个霸占台湾的美帝国主义者们的命运”<sup>⑨</sup>。这为郑成功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对殖民主义的罪恶做出了无情的揭露：“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sup>⑩</sup>。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肯定了近代殖民主义侵略下被殖民者抗争的正义性，并认为这种反殖民主义斗争是社会革命的先兆。而荷兰侵占台湾正是17世纪中国首次遭遇殖民主义侵略的见证。郑成功驱逐荷兰

①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8页。

②吴紫金，洪卜仁：《郑成功收复台湾记》，第4-5页。

③华而实：《汉衣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

④邓春阳：《尚钺同志怎样对待学术讨论》，《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第7版。

⑤唐星：《批判吴枫的“隋唐五代史”》，《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⑥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⑦岑家梧：《在历史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⑧参见李斌：《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缘由及战略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⑨范文澜：《驱逐美帝国主义 使台湾回归中国 范文澜在首都各界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2年2月2日第4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1-862页。

侵略者,收复台湾,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时间,成为与19世纪以来中国反帝国主义侵略史和20世纪中国革命史相连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斗争史的先声。荷兰殖民者作为一个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他者”,宣扬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事迹不仅可以淡化其以往汉民族英雄的身份尴尬,而且能凝聚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因此,郑成功从此便摆脱了以往汉民族英雄的身份印记,成为公认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一直延续至今<sup>①</sup>。

### 三、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英雄价值取向

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站在民族立场上发掘民族英雄,弘扬民族精神,是民族主义话语下民族英雄书写的重要特征。而相对于强调英雄伟人,马克思主义者更注重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特征。十七年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史学界的指导思想,郑成功民族英雄书写的价值取向也逐渐从民族立场转向人民立场。

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史学思潮之一。民族主义话语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将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并“制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的共同体”<sup>②</sup>。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在维护民族的统一性、连续性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陈布雷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中阐明了民族英雄对于民族本位历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通过对民族伟人事迹的讲述,可以起到“证明中国民族的优越”“兴敬爱之念与继起的努力”“激发舍身报国的志气”等作用<sup>③</sup>。郑成功即陈布雷所列举的“以遗臣遗民抗新朝而殉难或拒命而退隐者”一类中的伟人。在民族立场下,对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更侧重其个人精神品质,通过对其精神的弘扬和崇拜,达成对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叙述。薛澄清认为研究郑成功历史的最大原因便是要使人崇拜“因反抗以恢复吾民族之自由平等者”,不至于“埋没吾民族固有之精神”<sup>④</sup>。魏如晦在制作电影《海国英雄》时也认为,这部剧的主要目的是弘扬郑成功的伟大精神,即“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忍受人间一切的惨痛,不为最大的失败灰心,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不屈不挠,苦斗到底,一个韧性的恢复故土的伟大的意念与实践精神”<sup>⑤</sup>。钱海岳在《南明史》的《郑成功传》中称赞郑成功“倦念旧君,筮路蓝缕,独辟扶余,用天复之纪岁,如克用之忠唐,三世不渝。美矣哉!三百年遗思余烈所维系也,岂仅如田横居岛耻为亡虏已乎”<sup>⑥</sup>,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发掘郑成功的优秀品质,使之成为民族固有的光辉精神传统,激励人们继续为民族而奋斗抗争。

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历史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sup>⑦</sup>，“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sup>⑧</sup>。在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论述上,民族问题被置于阶级问题的从属地位。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

①《(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将郑成功事迹放在“统一台湾”小节下,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事件”,在大事编年中,与郑成功相关的有三条,其中两条都与郑成功复台直接相关。参见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②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③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4期。

④薛澄清:《郑成功历史研究的发端》,《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年第1期。

⑤魏如晦:《海国英雄——郑成功》,上海:国民书店,1941年版,第22页。

⑥钱海岳:《南明史》(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9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利时，被压迫民族才能得到解放<sup>①</sup>。列宁也指出：“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sup>②</sup>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英雄并非在民族立场而是在人民和革命的立场上来讲的，他在《法兰西内战》中便多次称赞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sup>③</sup>。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正是在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期，在抗战救亡的时局要求下，挽救民族危亡、抵抗日本侵略成为当时的最高价值。因此，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便成为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思想。阶级立场与阶级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突出特点，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1951年，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会议上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立场问题。周恩来肯定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民族观念和民族立场，并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要有“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最后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sup>④</sup>。朱杰勤于1955年发表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可谓站在人民立场研究郑成功的开山之作<sup>⑤</sup>。朱杰勤的论文跳出了以往书写清军入侵及收复台湾时的汉民族立场，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加以阐释，刷新了郑成功的历史书写，在此后的郑成功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其一，他认为郑成功反抗清军的正义性不在于清军是相对于汉民族的异族，而是因为“满清侵略者”到处屠杀人民，其收复台湾也不在于“存续汉统”或“殖民新地”，而是因为“同胞日受外来侵略者的压迫”。郑成功的抗清和驱荷“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而获得人民的支持”，仅凭他的个人才智是做不到的。其二，朱杰勤将郑芝龙作为抗击荷兰侵略者的先驱人物，认为郑芝龙以少数中国水师击败荷兰侵略者，是获得群众支持的正义战争，打击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削弱了荷兰侵略者的海上力量，是“收复台湾的前奏”<sup>⑥</sup>。郑芝龙不再是反衬郑成功坚持抗清的“汉奸”投降人物，而成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反抗殖民侵略的先驱。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朱杰勤才对郑芝龙进行了“翻案”，把人民的支持作为郑氏父子成功击败侵略者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前所述，新中国初期仍有许多学者将明清嬗代看作是满族和汉族的民族斗争<sup>⑦</sup>，从而站在民族立场上肯定郑成功的抗清事业。1958年的“史学革命”一方面批判这种“大汉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立场，另一方面史学领域又提出厚劳动人民薄帝王将相，提倡书写以劳动人民为主的历史。同一时期，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命题逐渐成为解决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sup>⑧</sup>。因此，人民立场取代了民族立场，成为当时民族英雄的最高价值。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书写中也充分肯定了人民的重要性，而非仅仅歌颂郑成功个人的英雄神武。陈国强在厦门讨论会上总结郑成功胜利收复台湾的原因时，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列为第一位，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关键”，而把“郑成功的英明领导”放在最后一位，仅认为其起到了“一定作用”<sup>⑨</sup>。总之，在十七年时期的郑成功历史书写中，分析郑成功的阶级立场，发现他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从人民立场阐述郑成功抗清和复台的意义，承认郑成功的阶级局限性，是郑成功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9-410页。

②《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7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68页。

⑤在此之前朱偁发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解放台湾之役》，但只是对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的叙述，并未作深入研究，详见朱偁：《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解放台湾之役》，《新建设》，1954年第10期。

⑥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

⑦参见李洵：《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光壁：《明朝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这一时期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了叛乱，中共中央在给青海省委的批示中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详见李振宏，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⑨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

族英雄价值取向的典型特征。

#### 四、余论

郑成功自晚清以来虽然一直被称为民族英雄,但十七年时期其历史书写承载的政治语境、民族认同及价值取向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抗战语境到国家统一语境,从汉族的民族英雄转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英雄,从发扬民族精神的民族立场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立场,是郑成功民族英雄历史书写转变的三大特征。郑成功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也折射出民族英雄这一历史概念在十七年时期的转变,对此后新中国民族英雄的重新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兴盛于日军侵略、神州陆沉的民族危急时刻,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战时”特色。从中国历史上寻找抗战精神资源是当时的不二之选,但从史学本身来讲却存在着简化历史、不当类比等缺点。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稳定、促进国家统一成为新的时代任务,多民族国家的现状也要求史学界必须摆脱以往以汉族为中心、忽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在史学界的确立,推动新中国时期对于民族英雄的认识逐渐从民族立场转向人民立场,有效地缓解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战争中产生的民族英雄合法性尴尬问题,填补了民族主义史学褪去后的价值空缺,因而也成为通行至今的民族英雄书写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十七年时期对民族英雄的书写仍遗留下来一些问题: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发展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如何历史地看待古代不同时期各民族政权间的战争,而非将其视为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问题在十七年时期未得到重视。同时,将人民立场确立为民族英雄的最高价值取向,实际上淡化了“民族英雄”一词中“民族”的指向作用,从而极大扩展了民族英雄的范围,将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都列入其中,也就减弱了这一特殊名词的效力,改革开放后民族英雄讨论中的“广义”与“狭义”之别,正是这一问题的继续<sup>①</sup>。以郑成功的历史书写为脉络,重审十七年时期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对新时代如何书写、理解民族英雄必将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马晓雪]

<sup>①</sup>如白寿彝指出“我们过去讲民族英雄,常常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的,而且往往一讲到民族英雄,总是在民族斗争中出现的,尤其是在斗争中牺牲的人。我看,是不是不要局限于这个方面,把范围放开一些不好吗?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民族,我看,这是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许多少数民族人物,在各自的民族中立下很大的功劳,把本民族的历史推向前进,也应该看作是英雄,并不是非要在抵抗什么后牺牲的才算是英雄。我们把民族英雄的含义放宽一些,意义就更大了。契丹族、蒙古族、满族,还有别的一些民族,都有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是不不少的,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详见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崔明德也赞同“应把民族英雄的范围放宽一些,不能只局限于从民族战争中寻找,而更不能只从民族战争中牺牲的人物中寻找。事实上,大量的民族英雄应当是产生于众多的既对本民族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中”,详见崔明德:《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二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而陈梧桐认为“只有那些坚决反抗民族压迫和外国民族侵略,在斗争中表现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才能称为民族英雄。根据这个原则来确定民族英雄,便可以把民族英雄与其他的杰出人物区别开来”,详见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